

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

当代国际高等教育 改革的趋向



高等教育出版社

G7-4

当代国际高等教育 改革的趋向

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
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集了国内九所高等院校的比较教育学者、研究人员撰写的对苏、美、英、法、日、联邦德国等发达国家和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泰国、南朝鲜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方面的论文汇编。这些论文全部为各校承担国家教委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委托的合作研究课题。

文章分别介绍和评述了上述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简史、现状以及当前改革的主要动向和趋势，提供了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国家教委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还撰写了关于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综合研究报告。

此书对高等教育各级领导部门、教育政策研究人员、高等教育工作者和外国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均具有阅读和参考的价值。

当代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向

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50 000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101 50

ISBN7-04-001070-4/G·86 定价2.70元

出版说明

80年代初以来，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与全球经济、政治竞争的形势和面向21世纪的未来目标，国际上出现了促进科技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育质量的潮流，许多国家先后就此作出了新的重大决策。

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要总结自己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外发展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号召要努力使我们的教育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

值此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遵循上述决定精神，国家教委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于1986—1987年，组织国内11所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和有关单位的教授、专家，就当代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对一些经济技术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地区），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在共同研讨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探索了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参加本项目研究的单位与人员包括：

杭州大学教育系	王承绪、张维平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	符娟明、周渠
东北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	梁忠义、孙启林
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	钟启泉、李其龙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	陈德民、花永泰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	李卓宝、江丕权
中山大学高教研究所	吴福光、陈卫平
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	赵秀琴、刘孟州、 陈俊英、张玉琴
同济大学联邦德国问题研究所	肖友瑟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黄松赞
四川大学高教研究室	曾向东
东南亚研究所	秦力
中央教科所比较教育研究室	高如峰
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事局	张保庆
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发展与 政策研究中心	李之保、朱承平、 周满生

本书主编李之保，付主编周满生。

限于篇幅，我们仅对本项研究成果的有关部分选编出版，未能全部或全文发表所有的研究报告。

本书可供高等教育工作者、教育政策研究人员和外国高等教育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由于我们研究水平和资料的限制，本书定有诸多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 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向 李之保 周满生 (1)
苏联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 周 渠 (27)
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梁忠义 (62)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
..... 赵秀琴 刘孟州 陈俊英 张玉琴 (85)
法国高等教育改革动向与趋势 高如峰 张保庆 (114)
最近英国高等教育的动向 王承绪 (135)
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 符娟明 (152)
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改革动向与趋势 李其龙 (188)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调整与改革 柯 森 (211)
印度高等教育改革动向与趋势 曾向东 (223)
泰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 陈德民 花永泰 (253)
新加坡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 黄松赞 (271)
南朝鲜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与趋势 孙启林 (296)

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向

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

李之保 周满生

一、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形势与背景

(一) 基本形势

进入 80 年代以来，世界科技、经济和政治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国家都在制定战略、调整政策、采取措施，进行激烈的竞争，适应未来。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面对上述形势，国际高等教育也处于新的改革进程之中，各国高等教育的功能与任务、内容与结构以及管理体制等都已经或继续发生变革。

许多国家把高等教育的改革列为本国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视作实现战略的重大支柱，由国家的最高当局直接组织领导并广泛发动社会各界讨论高等教育改革的工作。

苏联是由党中央与部长会议发动国内上千万人员参加讨论后，于 1987 年 3 月作出了《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的决定。日本是在内阁总理大臣直接领导下，由专设的“临时教育审议会”（以下简称‘临教审’），经过 1984—1987 年的三年时间，向国民进行调查研究后，提出了改革高等教育和振兴学术研究的咨询报告，交政府付诸实施。“临教审”在做出最后一次咨询报告后，虽于 1987 年解散，但为更进一步推动“临教审”有关教育改革教育的实施，于同年 8 月 21 日成立了以文部相为部长的“日本教育改革实施总部”，作为继续推动改革的体制。美国联邦教育部和卡内基基金会通过长达数年的全国规模的调查，

分别于 1984 年和 1986 年公布了提高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报告，它将对该国的未来教育发生重大的影响。印度政府人力资源开发部在 1984—1985 年研究了国家与教育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于 1986 年制定出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纲领性的国家教育政策。法国政府在 1984 和 1986 年先后提出了两部高等教育法，全面反映了对高等教育及其改革的新规定。英国政府在 1985 年向议会提出《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绿皮书的基础上，于 1987 年 4 月发表了《迎合挑战的高等教育》的白皮书，就提高本国高等教育质量和改革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作出了重大决定。联邦德国科学教育部在 1985 年制定了《高等教育总法》之后，西德大学校长会议于 1987 年 7 月又提出了《高等教育建设总规划》。东南亚和东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不同的组织与形式，也在研究与规划本国未来的高等教育。

1985 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是我国在新时期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总结过去经验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基础上，文件规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全面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要点。

为了深入进行我国教育改革的工作，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也要注意研究与借鉴国外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此目的，我们在组织对 11 个国家与地区的高等教育分别研究的基础上，就当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一般趋向，并着重从高等教育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方面，进行了以下的探讨。

（二）一般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或出于当时恢复与振兴经济和稳定社会政治的需要，或由于摆脱殖民统治，新获政治独立，推行工业化政策，进而争取经济独立的需要，他们的高等教育事业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次空前迅速的大发展，在校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学校的规模极大扩展。（见附表）。以几个国家为例，自 1950 年至今，美国高等学校入学人数提高了近 400%；近 25 年

来法国大学生人数增加了四倍；联邦德国入学人数从 1960 年的 29 万人，增加到 1986 年的 130 万人；苏联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期间，高校平均每年向国家输送毕业生 84.7 万人，较之第七个五年计划（1960—1965）期间增加 1.4 倍，在数量上已接近充分满足国家对干部的需要。印度高等学校入学人数，1946—1947 年为 22.5 万人，1984—1985 年增加到 344.2 万人。各国用在发展高等教育的经费也增加甚多。据统计，1960—1975 年间，法国高教经费增加了约 3 倍，美国和英国增加了 4 倍，联邦德国增加了 6 倍，日本则增加了 10 倍。许多人认为，这个时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倾向。

附表：1950—1984 年世界第三级教育学生数及年增长率

年	学生数 (千人)	年增长率 (%)
1950	6137	
1960	11, 656	
1965	19, 515	+9.5 (1960—1965)
1970	28, 097	+8.3 (1965—1970)
1975	39, 534	
1980	47, 216	+5.3 (1970—1980)
1983	51, 682	
1984	53, 194	+3.0 (1980—1984)

摘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6, 1980, 1986 年统计年鉴

高等教育通过培养与输送人才，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已是显而易见、人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它再一次说明了，社会经济政治的需要，是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展的推动力。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但是，这段期间高等教育数量的急剧增长，由于资源条件不够，要求学生不严、评价标准不高以及其它原因，也带来了教育

质量下降的问题，而且越到近来，这个问题越为突出。加上，70年代末和进入80年代，世界技术革命的最新发展，直接对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和间接对高等教育的服务功能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经济、政治的新形势也深刻地影响不同类型的国家，这些国家需要重新估价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解决改革和进一步依靠高等教育的问题。

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转入持续的经济衰退或缓慢增长时期，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困境。面向未来，日益加剧的国际市场竞争，更使许多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美国宣布自己的国家处于险境。自称“我国一度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上的创造发明无异议地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正在被世界各国竞争者赶上。”（例如，1986年美国的高技术进口量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出口量）“我们生活在有决心、有教养和有强大动力的竞争者之中。我们与他们争夺国际地位和市场，争夺的不是产品，还有来者、实验者和近邻工厂的创新思想。”“我国社会的教育基础目前受到日益增长的庸庸碌碌的潮流的腐蚀，它威胁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其它国家正在赶超我们教育上的成就。”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教育制度，把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办成高质量的学校。”

法国自70年代末开始，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加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为此，法国政府在不断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还寄希望于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要求教育能够应付国际经济竞争和技术发展的挑战，“成为国家现代化的尖刀”。认为“要振兴法国的经济，在经济和科技方面赶超世界其它强国，必须把改革高等教育、办好高等教育当作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

联邦德国1987年大学校长会议认为，联邦德国能否在发达工业国家中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和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关键是高等学校政策能否及时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英国工商界近年发出“英国繁荣正面临危险”的警告，呼吁英国的高等教育要走出象牙之塔，了解经济界的需要，改变高等教育制度。否则，英国的繁荣将处于危机之中。为此，英国政府于1987年发表了白皮书，决定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

日本为振兴科学技术，急起直追，正面临转折，力图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称雄世界，提出“面向21世纪，期待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教育和研究能够适应国民和社会各种要求，有助于培养人才及学术研究的创立与发展”，相应作出了以谋求“高等教育的个性化、高度化和加强研究生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

苏联为改变过去经济与技术发展在较长时间停滞不前的局面，于1985年提出了国家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为了解决这项具有政治影响的任务，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要求根本改进专门人才的教育工作，指出“对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改革，是现阶段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除了上述诸国自己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外，还出现了一些国家集团的共同行动。

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保持和增强在世界的竞争力，已经联合起来，协调行动，还采取了措施，组织和资助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高等教育的多种合作。苏联也决定积极开展同社会主义各国高等学校的联系，把它作为加强和扩大他们之间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重视经互会成员国在培养专门人才方面交流经验和进行深入的协作。东南亚国家也成立了进行高等教育交流的组织。

一些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和东亚的某些国家与地区，在过去25年中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与出口产品结构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它曾适应了70年代西方经济“过热”时国际环境与市场的需要，各国的经济和高等教育相应获得了发

展。但是，与过去相比，当今的国际经济形势有所不同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出口结构都需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克服国际市场呆滞和出口困难，保持竞争能力，避免经济衰退。这些国家也纷纷对自己的高等教育进行着必要的调整与改革。

综合上述情况，如果说战后初期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以从培养少数“尖子”向“大众化”方向转变为主要特点，着力学校与学生的数量发展，则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以来，国际高等教育改革是以重视高等教育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突出服务经济为基本特点，高等教育更加“职业化”，着重提高质量和加强科技研究。由此派生的便是高等教育结构与培养人才途径更趋“多样化”、成人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紧密结合以及改革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特别是权力的“分散化”。

二、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向

(一) 密切高等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以利高等教育面向社会需要

1. 高等教育要更有效地为经济服务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高等教育担负着为社会培养高等专门人才与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使命。和基础教育相比，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更为直接和密切。从欧美等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看，教育确有一段时期脱离生产、脱离社会，成为一座“象牙之塔”。但是，现代生产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教育只有加强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联系，才能获得明显的发展。80 年代以来，无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更加反映与突出了这个趋势。

各国对高等教育的目标要求是多方面的。但是，较普遍地是突出了高等教育为社会经济服务这一基本方向。

苏联政府在 1987 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改革决定中，强调“干部

的熟练程度、素质及高度的责任感，在许多方面决定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集约化的规模和速度，”从而提出“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是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刻不容缓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时代的迫切要求是，提高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作用，”认为“这是长期影响经济、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决定“保证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要比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优先得到发展。”同时，要“对高等教育与中等专业教育进行深刻的改革，使之与现阶段加速国家社会一经济发展的任务相适应。”

法国政府在 1984 年颁行的《高等教育法》要求公共高等教育事业在国家计划范围内，为“推动地方和全国的发展，促进经济的飞跃”做出贡献，并规定“高等教育的组织要同职业界相互联系，职业界代表要参予职能部门教育计划的制定。”

英国政府在 1987 年关于高等教育的白皮书中，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有效地为经济服务，必须与工商界保持更紧密地联系，以促进企业的发展”。

联邦德国 1987 年大学校长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建设总规划要求调整政策，以使高等学校“进一步加强同经济界的合作，使高等学校科研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承担更多的新任务。”

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规定了类似的高等教育方针。如新加坡确立推行“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配合”的方针。实际上，该国的高等教育，由于国家引导学校同社会生产实际相结合，重视科技教育，为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提供了大批急需的具有知识的高级人才，被誉为是近 20 年来新加坡经济获得惊人成就的两大杠杆（教育与引进外资）之一。如今新加坡根据经济重组（以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工业取代 60—70 年代劳工密集型的初级工业）计划，制订了新的高级科技人才培养计划，侧重培养实用型工程师和加强专科教育，以培养中高层技术骨干，使高等教育继续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印度提出教育要与发展联系在一起，高等教育要适合社会改

革的方向。要求大学生必须走出教室，调查了解一些社会问题，要致力于社会发展，特别是为农村发展作出贡献；要发展与国家紧急需要有关的技术；要把教育计划、人力计划和发展计划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大学课程应依地方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调整。

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是确保本国成为不仅是便宜的原料出口国而且是成品制造国。为此，要相应地改变教育制度以确定新的发展次序和新的研究领域。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需要最多的都是受过技术教育和训练的高水平的工作人员。要优先考虑培养科技方面的大学生。要使教育计划同整个经济计划相协调，以使人才需求计划同教育输出相一致。高等教育的政策主要为马来西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所支配。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种类型和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要有效地为经济服务，势必需要进一步“职业化”和更加“多样化。”

2. 高等教育机构与办学途径日趋多样化

各国对人才的需求，不仅是高级科技与管理人员，还有大量的熟练的中级技术人员。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建立适合需要的合理结构。其具体表现是各类高等学校并存，培养目标互异和学制灵活多样。这样，既满足了社会多方面的需要，也适合了不同背景、水平、能力的学生升学与就业的要求。在高等教育的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等三个基本层次中，近些年各国的短期学院受到重视，获得发展。这里我们着重讨论这个层次高等教育的趋向。

首先是短期学院的数量扩大，学生增长：如，日本的短期大学从 1965 年的 269 所，在校生 147563 人增加到 1985 年的 543 所，在校生 371095 人。目前美国的初级学院与社区学院已经发展到 1000 余所，约占美国高校总数的三分之一。1985 年短期学院学生已占美国高校学生总人数的 43%。澳大利亚坚持高等教育的“二元体系”，即由大学和学院两类机构组成。后者主要提供

的是职业性教育和训练。联邦政府采取措施支持学院发展的同时，还遏制学院转为大学，以保持高教水平结构的平衡，避免浪费高级人才与办学财力。

其次是短期学院面向地方，为本地社会经济服务。美国的社区学院便是地区的公立教育中心，在学科设置和课程安排方面，目标明确，职业性强，与工商界保持密切的联系，注重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强调教给学生一技之长，为毕业生提供较多就业机会。

第三是短期学院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如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同时采用全日制、半日制、工读交替制等多种形式授课。美国、西德、日本等的短期学院采用远距离授课方式。短期学院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常随本地区需要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

第四是短期学院与其它高等学校衔接的灵活性。美国的初级学院由于设立转学性和终结性两种学习计划，使它成为美国三级结构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目前美国初级学院毕业生转入四年制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的，已占初级学院全部毕业生的 $1/3$ 。日本实行了两年制大学与四年制大学的学分互换，使有志深造的学生能够继续升学。由于西方高等学校的学费较为昂贵且不断上涨，很多学生从减轻个人与家庭经济负担出发，愿意先在初级学院就读，尔后再转入本科的三、四年级继续深造。

80年代在西方国家经济不振的情况下，短期学院更加发展，显得颇具活力。归根结蒂，这是因为它与社会联系密切，能比较有效地为经济服务，也符合学习者的需要。

与此同时，为了发展新兴产业，开发高技术，加强国际竞争力，很多国家还注重改革与加强研究生层次的教育。美国通过使学位多样化，保持了研究生教育的活力。它在保留学术性研究学位的同时，着力发展了职业性研究学位，以满足公司等部门对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要，从而使“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力量得到保证。

日本为振兴科学技术和满足企业及尖端科研部门对高级专门人才日益增长的需要，决定从质与量两方面完善研究生院，包括采取招收社会成人入学做博士研究生的各种条件弹性化的措施。在入学资格方面也要缓和形式主义的限制并进一步扩大博士后研究制度。

苏联政府决定加强研究生部的工作，建立博士生部，以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解决高层次人才年轻化问题。

新加坡和南朝鲜从本国经济、产业、技术、出口等结构转型的需要出发，也提出了增加研究生的比重和把注意力转向以研究生院为中心的大学教育，向知识的高层次推进。

3. 建立多种形式的教育、生产、科研联合

进入80年代前后，很多国家的高等院校与科研部门、工商企业进行了更广泛与深入的合作。三方面合作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有了新的发展，更趋成熟。这种联合，对有关三方都有重要意义。

1987年苏联决定把“实现教育、生产和科学研究一体化”作为改革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的最重要的方针和基本动力。

日本把加强与改善“产、官、学”（即产业界、政府、大学）的研究协作，作为科学技术振兴和人才培养的一项重大政策措施，列入国家计划。为利于基础研究和发展高技术，日本政府正在进一步完善这一科研体制，调整有关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更多地发挥政府的领导作用和加强大学的基础研究。

具有教学、科研、生产（推广）体制悠久传统的美国，近些年又建了上百个大学—工业联合体（中心），诸如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多学科研究中心及各种类型的科学园、区。

英国于70年代开始兴起了在大学内建立科学园、区的热潮后，最近又宣布英国将建立有大学参加的七个地区性的技术中心，以加速技术成果向工业企业转移。

联邦德国近年来“工学交流中心”大量兴起，它加速促进了高

校与企业在人员、设备、经费、技术等方面的广泛交流。

新加坡在 1983 年也借助国立大学的力量建立了本国的科学园。

看来，教育、科研、生产多种形式与内容的紧密结合，无疑是高等教育面向经济的世界性的趋势，也是高等教育改进培养工作的重要途径。

“三结合”形式的出现，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新技术革命与战后世界经济的空前发展，反映了科学理论对新技术的指导作用以及科技对现代化大生产的推动作用。科技是生产力，再次得到历史证实。高等学校智力密集，最能产生新思想，创造新知识，开发新技术。与企业联合起来，就可能尽快地把大学的上述潜力从优势变成现实优势，无论对新兴产业的建立，高技术的开发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都能产生巨大作用。通过联合，还能缩短科研成果到制造产品之间的周期。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讲，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变化，日益要求高校培养更多富有创造能力、应变能力的新型人才。传统的封闭型的大学无法满足这一点。高等学校必须向社会开放，与社会密切结合，在社会实践中培养人才。而“三结合”则为大学的教师、研究生以至本科生提供了所需的接触实际的机会与条件，因而有利于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在结合的过程中，高校由于获得经费收入，还提高了自我发展，改善办学条件的能力。

教育、科研、生产三方的结合，形成的是整体优势，取得的将是综合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这个发展趋势，也是相当明显的。

根据上述的实践，苏丹教育界甚至认为，要建立全新的高等教育概念，其实质是应把高等教育理解为教育、科研、生产三者的整体过程。高等教育并非完全关在校园内进行，社会企业和科研单位也要对高等教育承担社会任务，做出贡献。这样，一部分教学过程将在科研、生产部门中进行。智力支援也从过去的“单向型”（高等学校支援工商企业）发展为“双向型”，科研单位、